

文学多棱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朱文斌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文学多棱镜



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朱文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多棱镜: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朱文斌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 - 7 - 210 - 04801 - 5

I . ①文… II . ①朱… III .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

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②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899 号

文学多棱镜: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作者:朱文斌

责任编辑:章雷

封面设计:聂聪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http://www.jxpph.com)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18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4801 - 5

赣版权登字—01—2011—13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22.80 元

承印厂:南昌市印刷九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朱文斌

给这本小书取名“文学多棱镜”，意在从不同维度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这是本人多年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一点心得体会。说来惭愧，作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本人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兴分支方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简称华文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的研究反而关注得较少、涉足也不多。不过，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华文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华文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本人在学校里也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故而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打小闹”之作，正所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近来将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字整理了一下，没想到竟然也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于是集束成书。本书根据所论述的内容，可以分成三编，即“中国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关系研究”、“地域文学研究”、“作家作品与思潮研究”等。这是一种专题性的分编方式。

第一编“中国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关系研究”收集了七篇文章，都是和华文文学相关的研究，其中《作为“殖民者”的鲁迅——论鲁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与接受》与《论曹禺剧作在南洋的传播及影响》这两篇文章涉及鲁迅和曹禺在东南亚华文文坛传播与接受的问题。前者指出了鲁迅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影响，有理有据地批驳了东南亚地区有一部分学者套用西方“后殖民理



论”，认为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经典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抑制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观点。后者指出曹禺剧作在南洋各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7 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洋话剧的艺术水平和演出水准，并开创了南洋多幕剧发展的先河。一直到今天，曹禺剧作仍然以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南洋剧坛发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鲁迅和曹禺都未曾去过东南亚，但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是以华文文学为视角切入现代的经典作家作品，让我们发现了以往被学界所忽视的内涵，拓展并深化了新世纪以来的鲁迅与曹禺研究。《命运与抗争——鲁迅〈祝福〉与李昂〈杀夫〉比较论》则是一篇和台湾文学相比较的文章，鲁迅《故乡》中的祥林嫂和台湾作家李昂《杀夫》中的林市确实有许多值得比较的地方，文章从“族权压迫”、“夫权压迫”和“神权压迫”等三个方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祥林嫂与林市之间的异同点，发现两岸不同时空下的妇女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张爱玲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 世纪 40 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后远走他乡，在美国西海岸孤寂地度过一生。由于其独特而传奇的人生经历，海外华文文坛也把她看成是一位海外华文女作家。《“张爱玲神话”及其反思》深入分析了华文文学世界“张爱玲热”的原因，反思了当前误读张爱玲的各种现象，呼吁回到文本重新解读张爱玲。《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胡兰成”情结》较好地将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复杂爱恋关系与小说文本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小说，发现其中的男性人物大多自私、虚伪、变态，虽然不能和胡兰成形象完全对应起来，但是却总能看到胡兰成的影子，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能把男性描写得如此透彻深刻，这不得不让人佩服与惊叹。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张派传人，事实上，虽然李碧华的创作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但是两者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张爱玲与李碧华爱情观之比较论》一文则选择了她们的爱情观为例进行比较，发现了两人之间的诸多不同点，总的来说表现在张爱玲擅长描写荒凉的悲剧，那是爱情与现实妥协的无奈，而李碧华吟唱爱情的哀

前 言

歌则主要是面向社会、尤其是男性社会发出带血的控诉。

另外,《爱情的解构——论上海、台北两城的异变爱情》则以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二辑中的王安忆主编的上海卷《上海街情话》和王德威主编的台北卷《微雨魂魄》为研究对象,将上海、台北这两座都市中两性之间产生的异变情感进行比较研究,为我们阐述了在新的世纪,婚姻家庭模式、两性情爱模式正越来越走向多元化与多极化,逐渐摆脱了性别的思维定式,趋向于自由。

第二编“地域文学研究”收集了五篇文章,都是有关浙江文学的论述。一是以越文化为视角对鲁迅进行研究,显得与众不同。鲁迅生长于越地绍兴,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响,《风景之发现——论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一文,从鲁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出发,运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有关“风景之发现”的观点,发现俯拾皆是的阴冷风景描写正是鲁迅阴郁悲观情绪的象征,而这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来源于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是其内面性的必然表现。《批判与幻灭——从〈故乡〉看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一文则以鲁迅小说《故乡》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发现鲁迅既受到越文化的正面影响——激越地批判现实、传播启蒙思想,又受到越文化的负面影响——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陷入阴郁痛苦的境地,不过,鲁迅都能较好地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协调在自己身上,借助于对《故乡》人与事的描绘来反省自身,并在反省中完成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

二是对浙江当代文学的深入描述与剖析。浙江当代文坛相比现代文坛寂寞了许多,因此对浙江当代文学进行梳理和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历经坎坷的“美丽工作”——陈学昭创作论》以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但创作成果丰硕的浙江籍女作家陈学昭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了陈学昭在艰难境遇中的执著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志,赞扬她辛勤而美丽地工作着,以自传体的形式把女性自己写进了历史、写进了时代,为中国女性觉醒、解放、抗争留下了真实而形象的历史记录。《论绍兴当代文学的发展及越文化意蕴》是一篇至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对绍兴当代文学发展作全面梳理的文章。文章分别对当代绍兴的小说、诗歌、散文、影视文学等几大领域的文学表现进行了梳理,虽然论述



文学多棱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较为简略,很多方面限于篇幅都是点到为止,但是脉络清晰,对于绍兴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还是很有价值的,而且结合地方文化——越文化对绍兴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论述,挖掘绍兴当代文学的越文化意蕴,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新时期以来浙江当代文学批评现状与反思》一文则是对新时期以来浙江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巡礼和总结,笔者由于手头资料的限制,可能还遗漏了一些有价值的批评论述,但是总体而言,梳理还是较为全面的。从文体批评、特色批评以及本土批评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不但让我们看到了浙江当代文学批评的实绩,也让我们看到了浙江当代文学批评的诸多不足以及亟需改进的地方。

第三编“作家作品与思潮研究”收集了六篇文章,涉及面较广,既有作家作品专论,又有思潮流派的梳理和总结。《〈边城〉:关于翠翠成长的神话》是从成长的角度重新解读沈从文的经典小说《边城》,认为翠翠因“现代”观念的入侵、祖父微妙心事的重压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走向成熟、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种烦恼而痛苦的过程,所以翠翠的这种“成长”与“成熟”并不是作者所想看到的,读者也能从小说行文中品尝到作者那隐伏着的悲痛与沉忧。《丰盈的灵魂与孤独的旅者——许地山创作论》从佛教、基督教、道教对许地山的影响入手,结合许地山的人生经历来理解他的小说文本,阐述力争深入浅出,较为细致地分析了许地山灵魂深处带有宗教色彩的孤独感。《独立苍茫自咏诗——冯至〈我是一条小河〉之解读》也是重读经典之作,通过深入解读这首诗可以发现,诗人冯至以其细致哀婉的情思、独特深刻的生命体验以及精致独特的艺术构思给我们描绘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与困境,为我们吟唱的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以及自我安慰的尝试。《一篇“有意思的散文”——论贾平凹的〈静虚村记〉》通过深入分析贾平凹的散文《静虚村记》,发现作者重返民族文化空间,汲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为自己所用,是在寻根中把传统诗化成了一种符合人性的自然存在,一种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和心灵结构的文化时空,以对抗或修复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破碎以及迷失了的人的心灵。

相对而言,《新历史小说“新”论》和《被告:1990年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等篇章则带有梳理思潮流派的性质。《新历史小说“新”论》一文是从“历史题

前 言

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等三个层面出发,论述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如何将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新颖的艺术方法植入历史小说创作之中,突出了新历史小说的“新”之所在。《被告:1990 年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以 1990 年这个中国当代史上颇为特殊的年份为背景,梳理了这一年度的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的文学表现,发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在社会传统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阻挠与控制下被推上了“被告席”,但依然不屈不挠地曲折前行,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与身份认同的结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前所述,本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并不深入,虽然在撰写的时候力争放在一个较为宏大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来展开,希望就自己的学识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但“客串”中写就的篇章难免有许多谬误之处,期待方家不吝教正。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编 中国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关系研究

作为“殖民者”的鲁迅

——论鲁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与接受 / 3

命运与抗争

——鲁迅《祝福》与李昂《杀夫》比较论 / 12

论曹禺剧作在南洋的传播及影响 / 25

“张爱玲神话”及其反思 / 33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胡兰成”情结 / 47

张爱玲与李碧华爱情观之比较论 / 60

爱情的解构

——论上海、台北两城的异变爱情 / 73

第二编 地域文学研究

风景之发现

——论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 / 89



文学多棱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批判与幻灭

——从《故乡》看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 / 97

历经坎坷的“美丽工作”

——陈学昭创作论 / 103

论绍兴当代文学的发展及越文化意蕴 / 118

新时期以来浙江当代文学批评现状与反思 / 130

第三编 作家作品与思潮研究

《边城》：关于翠翠成长的神话 / 155

丰盈的灵魂与孤独的旅者

——许地山创作论 / 162

独立苍茫自咏诗

——冯至《我是一条小河》之解读 / 176

一篇“有意思的散文”

——论贾平凹的《静虚村记》 / 181

新历史小说“新”论 / 186

被告：1990 年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 / 194

后 记 / 205

第一编

中国现代文学与 华文文学关系研究

作为“殖民者”的鲁迅

——论鲁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与接受

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在《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一文里,通过梳理鲁迅作为经典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本来被人从中国殖植过来,是要学习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可是最终为了拿出民族主义与中国中心思想来与欧洲文化中心抗衡,却把鲁迅变成另一种殖民文化,尤其在文学思想、形式、题材与风格上。”^①很显然,这是王润华挪借近年来学术界非常盛行的西方“后殖民”话语,对鲁迅及其作品影响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一事实所作的一种理论思考。“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殖民文化的主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与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材、新形式,因此不少人被迫去写远离新马殖民地的生活经验。”^②这里的潜台词是,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经典是新马写作人的“殖民者”,作为文化霸权抑制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进程。这是典型的“后殖民”话语。

①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7页。

②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9页。



文学多棱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后殖民”理论又称“文化殖民主义”(cultural colonialism),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挑战的理论,代表性学者有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在后殖民学者看来,第一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进行了话语控制。这种控制以当今世界上通用的科学话语形式为基础。这些话语形式可以有效地消解纳入其中的任何反对意见,而使反对意见本身成为它的容纳性和客观性证明。如人类学、人类文化学、哲学、政治学这样的系统话语形式不仅本身就是西方的,而且还被强调为世界性的普遍客观知识。在它们所形成的强大的话语支配领域中,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知识不得不处于屈从和边缘的地位,自然也就无法伸张与西方话语平等的合法性。结果是,第三世界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知识形式和历史时感到无力和焦虑,完全受制于第一世界的话语体系。正是依循这样的理论逻辑,王润华虚构了一个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主义”,相当于第一世界的话语体系,对他们本土的华文文学这一第三世界的话语体系构成“后殖民”关系,使得本土华文文学形塑自己时必须借助“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与文化,从而无法摆脱鲁迅等人的深刻影响与制约。所以他相信,本土华文文学必须以本土性的建构来反抗“中国中心主义”的话语控制,也就是摆脱“中国性”或者说“中国影响”。

王润华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思考后殖民文学问题,“我回返南洋之后,就建议并鼓励我的学生重视本土知识资本,从自己特殊的文化话语(边缘话语)来解读,不一定都要服从从中原文化产生的解读模式。”^①在他所著的《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里,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后殖民解读论文除了这篇《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之外,还有《鱼尾狮与橡胶树:新加坡后殖民文学解读》《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到处听见伐木的声音:吴岸诗中的后殖民树木》《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等等。这些析论分别涉及(西方)入侵殖民地和(中

^①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自序》,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国)移民殖民地两种后殖民文学的特性,对于西方或中国作为权力中心压抑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作出批判,其中对于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激烈。西方文学作为文化霸权抑制本土华文文学的成长这里姑且不论,但王润华把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也看成是一种文化殖民关系,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论集中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这里的前提是,在历史上西方宗主国曾经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过赤裸裸的直接统治,使这些国家或彻底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纷纷独立,取得了国家主权,摆脱了西方宗主国的直接控制,但是由于真正原因,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对于原西方宗主国的依赖。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所谓的“后殖民”关系了。所以,把同属于第三世界、曾经都是西方殖民地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看成是“后殖民”关系,从本质上说,纯属无稽之谈。

也许,王润华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他借用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所著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中的一个概念——“移民者殖民地”对应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类比是这样的:“当我们讨论后殖民文学时,注意力都落在以前被异族入侵的被侵略的殖民地(*the invaded colonies*),如印度,较少思考同族、同文化、同语言的移民者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像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的白人便是另一种殖民地。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的白人作家也在英国霸权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中建构其本土性(*indigeneity*),创造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特殊性的另一种文学传统。在这些殖民地中,英国的经典著作被大力推荐,结果被当成文学理念、品味、价值的最高标准。这些从英国文学得出的文学概念被殖民者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与典范,统治着殖民地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通过它所设立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典范,从殖民时期到今天,继续影响着本土文学。鲁迅便是这样的一种霸权



文学多棱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文化。”^①所以,他认为新马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文学,同时具有入侵殖民地与移民殖民地这两种后殖民文学的特性,即一种像侵略殖民地如印度的以英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另一种像澳大利亚、纽西兰的移民殖民地的以华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这种推论看起来非常有道理,的确能够迷惑人一时,但等我们抽丝剥茧之后,才发现原来王润华有故意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之嫌。因为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在历史上曾经是白人的殖民地,白人大规模地移民到这三个地区是当统治者,是他们征服了当地土著之后,使得被殖民的土著不得不以他们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从而在自己的黑色皮肤上带上白色人的面具。这三个地区相继独立以后,白人统治者追逐母国/原来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所以说这三个地区是移民殖民地,英国文学经典作为文化霸权继续影响本土文学的发展比较符合事实。但是,华人移民到新马/东南亚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从当初的讨生活或逃避政治下南洋,心态经历了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变化,一直以来,华人都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生活在南洋各地。二战前,与当地土著一起同是西方的被殖民者;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由于各种原因,华人又降为所在国的二等、三等公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排华”浪潮,常常面临“失语”甚至“失身”的威胁。因此,华人在东南亚的华文书写与白人在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的英文书写根本没有可比性,王润华根据片面理解引进“移民殖民地”概念,据此想当然地认为鲁迅等中国文学经典作为一种霸权文化抑制了本土的华文文学发展,无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像王润华这样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自居,主张以本土性对抗“中国中心主义”,试图摆脱东南亚华文文学身上的“中国性”或者说“中国影响”,已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的旗手除了王润华之外,还有马来西亚学者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以及张光达等人。他们都认为后殖民理论对马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颇为重要,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如黄锦树说:“马来西亚华人的复杂身份/马华文学的复杂性,早已(早该)是后殖民的议题。后

^①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3-214页。

殖民论述提供了理论的资源及大量的个案供参照,马华文学是现成、有待开发的反思场域。”^①张锦忠也说:“不管南洋色彩是否压抑的置换,只有以本土意识反抗中国文化霸权而产生的南洋文艺,才可能具有南洋文化属性或南洋意识。”^②林建国受台湾有关“断奶”言论的影响,甚至还提出震动马华文坛的“断奶”说,引起众多本土学者如方修、陈雪凤等人的批判。不管怎样,黄锦树等人的意图同样是彰显“本土性”而排斥“中国性”,“中国性的表现形态和叙述语言乃是中国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惯性运作,中国性并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简单,其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文学?……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性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作出调整转化,把毒瘤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③

王润华、黄锦树等人出于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土性建构的焦虑,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虽不无偏激,但从根本上说,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抛弃后殖民视角的褊狭,他们实际上是把如何正确看待鲁迅等中国文学经典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的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困扰东南亚华文写作者由来已久且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受中国五四文学运动余波影响而诞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从最初的中国文学支流(侨民文学)逐渐变为独立自主的本土文学(华文文学)的过程中,一直尝试着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马华文坛为例,20世纪20年代“南洋色彩”的开掘、30年代“马来亚地方文艺”的论战、40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等都昭示着马华文学一步一步地努力建构自身的本土性,最终脱离了与中国文坛相呼应的格局。当然,这种过程的完成还得归功于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

① 黄锦树《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第37页。

②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106页。

③ 张光达《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史)观》,吉隆坡《人文杂志》,2000年3月,第114—115页。